

中国少数民族地区金融支持政策的适配与选择的研究综述

刘博

(西南财经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 成都, 610074)

摘要: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发展会对区域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目前, 我国民族地区的金融支持政策相对单一, 学界针对民族自治地区金融支持政策研究也相对不足。在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过程中, 金融支持政策的制定往往缺乏市场导向, 呈现出发展模式趋同化, 机构、产品单一化的特征。同时, 这些政策也很少考虑到民族地区内部发展差异, 以及宗教、文化和历史的差别。这势必会弱化金融发展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甚至形成制约作用。这就需要探讨民族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的适配问题, 即对特定经济发展状态下的民族地区, 针对性地选择与之适配的金融支持政策, 使金融发展不脱离经济发展水平, 并最终推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

关键词: 民族地区, 金融支持政策, 门槛效应, 空间分异

引言

民族是人类历史进程中特定阶段的社会存在形式, 它从文化、政治等各个层面影响着经济发展, 而经济发展又是民族存在和演化的基础。在我国, 少数民族通常指的是除国家中人数最多的民族——汉族以外的民族。近年来, 国家高度重视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 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基础上, 给予了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地区一系列优惠政策, 推动了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社会事业的发展。

然而, 由于少数民族地区多为自然环境恶劣地区, 人口、资源禀赋本就不足, 又受到历史、文化、宗教等诸多社会因素的影响, 相对于我国东、中部发达地区而言, 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仍然处于落后状态, 且民族地区内部也存在着巨大的发展差异。在新的发展形势下, 我国面临着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艰巨任务, 这都要求进一步推动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

在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 金融发展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在学界看来, 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存在相互影响、彼此推进的关系。如何选择正确的金融发展模式, 如何采取恰当的金融发展方式, 如何制定适配的金融支持政策, 将是民族地区当前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问题。但是, 我国民族地区不同于汉族聚居区, 有其独特的历史、宗教、文化等社会因素。这对金融、经济发展过程将产生重要影响, 使得其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和特殊性。

一、国外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争论

(一) 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相关性的分析和论证

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探讨及研究一直是经济学和金融学的研究重点, 对两者关系的争论一直延续到现在。当国际金融危机、欧洲债务危机等金融海啸席卷全球之后, 不仅老牌的发达国家希望借由二者关系的探讨找到全球经济复苏之路, 而且新兴的发展中国家也期望从中找到经济增长的持续动力。

一部分经济学家认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无关, 或是金融发展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十分有限: 早在 17 世纪中叶, 古典学派就依据货币数量说提出了货币中性论, 认为货币数量的改变只会造成物价水平成比例地上升或下降, 对生产供给、实际产出和就业不会产生实质性的影响。Nagaraj (1996) 通过对 80 年代印度资本市场的研究, 认为股票市场仅仅将部分资金由银行存款转换成可交易的证券资产, 股市的膨胀并没有带来经济的繁荣, 却导致了企业固定资产投资额的下降。若是站在理性预期的角度, 金融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是相当有限的, 甚至是可以忽略的, 当前的很多研究没有考虑理性预期的存在而“恶劣地过度强调”了金融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Lucas, 1996)。而克鲁格曼 (Krugman, 2003) 在看到拉美

等国的金融自由化失败之后，则更坚定地认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是一种有限关系，金融发展仅仅是实际经济增长的结果，甚至能够反其道而制约经济的增长，导致经济崩盘。因此他准确的预测了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

另一方面部分学者对此持有不同观点，他们相信金融发展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且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戈德史密斯（Goldsmith, 1969）用35个国家的长期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金融结构的变迁与经济过程显著相关，著名的“金融结构理论”便应运而生。同时，戈德史密斯也为后世量化金融发展做出了贡献，提出用金融相关比率来考察金融发展的整体水平。随后，麦金农（McKinnon, 1973）和肖（Shaw, 1973）几乎在同时分别提出了“金融深化理论”和“金融压抑理论”，系统地阐述了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并认为“金融自由化政策”可以促进不发达国家经济发展。但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的实践却并非一帆风顺，金融约束理论分析框架逐渐被学界所接收。这一理论认为政府应对金融监管充分负责，在一定原则范围内对金融市场采取间接监控（Hellmann, Murdock and Stiglitz, 1997）。

随着金融学、数量经济学的发展，国外经济学家更多的通过定量分析方法来研究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关系。Pagano（1993）使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AK模型）进行定量分析，发现金融体系影响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即通过储蓄-投资比、居民储蓄率和资本边际生产率的改变实现，证明了经济发展与金融发展息息相关；Rajan和Zingales（1998）通过对不同产业的成长过程进行分析，将成长效应与金融发展水平联系起来，证明了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且这种关系在短期是非均衡的；Levine和Zervos（1998）对1976-1993年47个国家的数据建模分析，验证了银行发展水平、股票市场流动性与经济增长率、资本积累和生产率的提高之间的关系，说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具有强关联性；Gregorio和Guidotti（1995）选用私人部门的银行信贷率和GDP作为代理变量，运用实证手段探讨了金融发展与长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他们发现，在大样本的面板数据中，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呈显著正相关，但是各国的影响方向不一，拉丁美洲的面板数据分析过程中这种关系显著为负。这种负相关关系是由于拉丁美洲的金融自由化过程处于较差的金融监管环境之下造成的。他们进一步发现，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主要传播渠道的效率，而不是金融体量。而近年来，行为金融学方面研究的升温也为金融与经济的关系开阔了新视野，包括心理学、行为学的引入所带来的一些较前沿的研究方法。

（二）银行、资本市场与保险业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由于各国金融形式、金融结构的差异性，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文献开始关注银行、资本市场、保险市场等单一金融发展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上来。对于银行的关注，最初是从放松管制出发的。Jayaratne和Strahan（1996）通过对美国各州银行分支机构的准入管制进行研究，认为金融机构的变革可以直接影响经济增长。他们发现一旦对州内的分支机构进行改革，伴随而来的则是实际利率、人均收入和产量的显著增加。进一步，他们指出这种增长来源于银行系统的变化，改善银行贷款的质量，而不是增加银行放贷量，能够带来更快的增长。Arestì等（2001）以发达国家地区为研究对象，研究股票市场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但他们却通过时间序列分析，发现银行机构作为金融中介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承担着重要作用，这是股票场所无法比拟的。Santiago和Francisco（2004）认为将区域因素纳入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之中，正在成为研究热点，他们采用动态因果关系和面板数据技术，对1993-1999年西班牙的银行数据进行研究，发现在区域层面上，这一时期内的经济发展预示着金融深化的结果。与其他银行业务相比，针对融资企业或家庭的贷款服务提升，将是区域金融深化问题中的关键所在。

Rousseau和Wachtel（2000）认为，在新兴市场和发达市场中快速扩张的股票交易所机构，都会促使政策制定者们越发考虑其宏观经济的影响，这就需要进一步研究金融市场和经

济增长间的关系。他们运用较短时间维度的面板数据，构建面板向量自回归（VAR）模型，显示相对于传统金融中介机构，股票市场的流动性和活跃性在人均产出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说明了在全球化时代的当下，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和发展深度和潜在收益息息相关。在 Beck 和 Levine（2002）的一份世界银行报告中，来自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表明——资本市场效率和银行业信用扩张都能够很好的解释经济增长，而且这种关系并不是由于潜在的模型设计偏误、遗漏变量或者伪回归所导致。Alfaro 等（2004）通过研究外国直接投资（FDI）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发现，从 1975 年到 1995 年的各国数据显示，外商直接投资在促进经济增长中扮演一个模棱两可的角色。但是在拥有发达的金融市场的国家中，FDI 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效应。这一结果是在充分考虑内生性的基础上，对金融市场发展进行不同度量时都能得出的，说明具有发达金融市场的国家能够更有效率的利用 FDI。

虽然保险公司的金融中介作用变得越来越重要，但往往比银行和股票市场得到的关注较少，其主要作为风险转移的提供者为人们所熟识。Haiss 和 Sümegi（2008）采用欧洲 29 个国家的数据，时间跨度为 1992 年至 2005 年，进行面板数据分析，发现寿险对欧盟 15 国的经济增长具有积极作用，而财险则较大的作用于中欧和东欧地区的经济增长。据此，他们认为保险业的发展应当在宏观经济政策制定、金融发展研究中得到足够的重视。Arena（2008）认为，作为金融中介和风险转移或补偿的提供者，保险市场活动可以更有效的管理不同风险，并动员国内储蓄，以达到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他对 55 个国家从 1976 年到 2004 年数据进行分析，并使用广义矩（GMM）估计动态面板数据模型，验证了这种关系是一种强有力的关系。即保险市场活动（包括寿险和非寿险）和经济增长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寿险业务的发展，是高收入国家推动的结果，而非寿险业务的发展，是高收入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推动的结果。Outreville（2011）认为，保险市场的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应当是一种双向的关系，即经济增长的结果是收入提高，进而影响着保险市场的需求，然而从另一方面来看，保险市场的发展又决定着经济增长。

二、国内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国外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大量文献为国内相关研究的开展提供了夯实的理论基础，从而国内学者在借鉴国外的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基础上，运用国内相关数据进行了一系列实证研究。

（一）基于国家层面的探讨

在金融加速器理论的基础上，赵振全等（2007）运用门限向量自回归（TVAR）模型在宏观层面上对中国信贷市场与宏观经济波动的非线性关联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在 1990 年 1 月至 2006 年 5 月期间，中国存在显著的金融加速器效应，表现为对于相同特征的各种外生冲击，经济波动在信贷市场处于“紧缩”状态下的反应均明显强于信贷市场处于“放松”状态下的反应。周业安、赵坚毅（2005）则认为，在研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国内众多研究往往没有考虑金融市场化过程，导致结果有失偏颇。他们构造金融市场化指数对二者关系重新进行检验，结果发现市场化过程明显影响经济增长，且这种影响是正向的，但金融结构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是相反的。

武志（2010）也认为，在我国现实中，由于存在着经济货币化比率异常等一些特殊情况，在对金融发展水平进行考察时，需要通过剔除虚假成分得到我国金融发展的真实水平，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间关系进行经验研究。同时，他指出虽然金融增长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但金融发展的内在本质却只能由经济增长所引致。与众多文献认为金融发展能够有力促进经济增长的结果不同，叶志强等（2011）利用中国 1978 - 2006 年各省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我国的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不相关。他们进一步发现在金融发展的过程中，城乡收入差距呈显著扩大的态势，同时金融发展与农村居民收入增长也呈现负相关，

而金融发展和城市居民收入增长则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

（二）基于区域视角的探讨

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各区域自然资源等因素差异较大，通常学界的研究也会针对具体区域而开展，一种常用的做法是将我国分成东、中、西三大地带分别进行考察。艾洪德等（2004）对我国三大地带分区域进行了实证回归，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上，东、中、西部地区分别呈现出不一样的特征。就东部地区而言，与全国数据的结论一致，二者是正相关关系；而中、西部地区的金融发展存在明显滞后效应，与经济发展呈负相关关系。王景武（2005）则是利用的 ECM 模型，并对金融与经济关系进行了格兰杰因果检验，其结论与艾洪德等人相似——我国东部地区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具有正向的因果关系，而西部地区呈现出相互抑制。冉光和等（2006）进一步考察了我国东、西部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在面板数据协整的基础上，构建了面板数据 ECM 模型，分别从长期和短期考察二者的因果关系。他们的结果显示，在长期中二者因果关系成立；在短期内西部地区二者不具备因果关系，东部地区二者因果关系显著。

另外一种研究类型则是针对区域金融开展研究。张军洲（1995）将区域金融定义为一个国家金融结构和运行在空间上的分布状态，在外延上它表现为具有不同形态、不同层次和金融活动相对集中的若干金融区域。不同的区域蕴含着不同的自然禀赋、制度文化和社会条件等，这些差别必将导致金融发展的不同状态，研究二元金融就是要承认这种差别和正视这种差别。曾康霖（2008）进一步指出，二元金融的产生是与我国二元经济的存在密切相关的。从制度变迁的角度看，二元金融可区分为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从空间差异的角度看，二元金融可分为发达地区金融与欠发达地区金融。李敬等（2007）运用 1992—2004 年的省际面板数据构建并估计了区域金融发展的协整方程，并进行了夏普里值（Shapley value）的分解。分解结果显示，各省市之间经济地理条件和国家制度倾斜等方面的差异是形成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的主要原因，这使得我国区域金融运行严重失衡，进而对经济金融发展造成了不利影响。

虽然学界对金融与经济的关系存在争论，但可以达成共识的是金融发展并不能完全脱离实体经济的发展而一枝独秀，二者的发展总是相辅相成的；如果金融经济的发展过分超前于实体经济的发展，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泡沫就会破灭，金融危机就难以避免；相反，如果金融经济的发展过分落后于实体经济的发展，没有金融泡沫，经济发展必然受阻，停留于较低的发展水平上（刘锡良，2004）。

（三）囊括空间因素的探讨

随着空间经济学“核心-边缘”模型的建立，对金融发展的相关研究也开始将空间因素纳入考虑范围。卢佳和金雪军（2007）从金融地理学视角出发，构建了研究中国区域金融发展水平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实证结论表明：经济地理因素中地理位置对区域非国有金融发展有显著影响；新经济地理因素中区域人力资本水平、信息化水平、历史经济基础等都对金融发展有显著正影响，而科技水平和交通运输条件影响不显著；经济政策对金融发展有差异化的区域效应。张凤超（2007）则更详细地从金融流和根植性探讨了区域金融系统空间结构的形成机理及其演进，并提出区域金融系统是以金融产业为核心物质内容的复合系统，其空间结构表现了金融核心、金融腹地与金融网络体系三个要素的空间排列与组合，并具有“核心-边缘”式特征。王纪全等学者（2007）也通过研究发现，我国金融资源的地区结构不合理，金融资源分布不平衡，东部地区集中了全国绝大多数金融资源，且人均金融资源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种不合理的地区分布导致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不高，中西部地区的金融资源难以满足经济发展需求。同时他们还发现，金融资源和 GDP 间存在长期稳定关系。王认真等学者（2012）亦采用 Moran 指数等空间工具证明了金融资源与 GDP 具有显著空间相关性，并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对金融资源空间配置的经济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初期和当期金融

资源对当期 GDP 具有显著的正的空间溢出效应，金融资源促进了区域经济增长。其中，金融资源空间配置非均衡是区域经济增长差距的重要原因。

空间经济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就是经济集聚问题，相应地在金融发展的研究上就不可避免地要讨论金融集聚问题。任英华等学者（2010）通过构建了金融集聚影响因素空间计量模型，对我国 28 个省域金融集聚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金融集聚在省域之间有较强的空间依赖性和正的空间溢出效应。区域创新、经济基础对金融集聚促进作用显著；对外开放在期初对金融集聚有显著的正效应，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作用正逐渐减弱；人力资本对金融集聚促进作用的发挥需要一个吸收和消化的过程。刘军等学者（2007）认为金融集聚通过金融集聚效应、金融扩散效应以及金融功能促进实体经济增长。金融集聚效应通过外部规模经济效益、网络效益、创新效益、加速技术进步效益、自我强化机制效益影响经济增长。金融扩散效应通过“涓流效应”和“极化效应”促进经济活动。金融集聚通过金融的风险管理功能、信息揭示功能、公司治理功能、储蓄集聚功能和便利交换功能影响和促进经济增长。李林等（2011）考虑到中国金融集聚的空间地理特征，运用空间计量分析方法对金融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效应进行了分析。通过计算中国金融业的 Moran' I 指数，确定中国金融集聚存在空间相关性，并刻画了 2005 年与 2009 年中国金融集聚的 Moran' I 指数散点图，得出中国各省金融集聚地理空间相关模式。并通过构建空间计量模型，检验出金融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

（四）对金融生态观、金融结构的探讨

随着经济转轨的不断深入，金融风险的表现形式会不断出现变化，需要解决的风险隐患也不断出现变化，周小川（2004）最早提出了金融生态环境的概念，认为通过对法律体系的不断完善能够形成我国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进而化解这些风险隐患。徐诺金（2005）认为，金融生态是对金融的一种拟生化概括，体现了金融的生命性、竞争性和自调性的特征。金融生态总是在一定的环境作用和影响下形成的，把握金融生态特征，改善金融生态状况都必须高度重视金融生态环境问题。说到底，就是要改善法治和法制环境。周小川（2009）进一步指出，金融生态评价无论对地方政府的融资还是对银行发放信贷都十分重要，当前亟需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金融生态评价模式和方法。基于金融生态的核心内容，曾康霖（2009）认为它的外延应当有金融生态平衡、金融生态周期、金融生态环境。用金融生态取代金融环境，正是因为金融生态这一概念有新的内容，具有特殊意义。生态平衡是指生物群体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共存共荣、协调发展、良性循环，它表明生态的群聚状态。生态周期就是生命力的持续过程，金融企业的生态周期，也就是它的生命力的持续过程，而创新是增强生命力的源泉。生态环境是生存的条件，金融企业生存的最重要的条件是信用。加强金融生态环境建设，核心是要加强信用制度的建设。把法制建设纳入金融生态环境之中是必需的、合理的。在健全金融生态环境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文献开始关注金融结构的合理性。林毅夫、孙希芳（2008）首先运用中国 28 个省区在 1985—2002 年间的面板数据，考察银行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在中国现阶段，中小金融机构市场份额的上升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基于此，林毅夫、孙希芳和姜烨（2009）从理论上构建了一种分析框架，即最优金融结构理论。他们认为，在某一发展阶段，一国所具有的比较优势产业、技术结构性质，以及持续经营企业的规模、风险特性，都由这一国在特定发展阶段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因此，特定阶段的要素禀赋决定金融结构的根本性因素。这就要求在各个经济发展阶段中，金融结构必须满足实体经济对金融服务的各项需求，一旦能够有效地实现金融体系的基本功能，促进实体经济发展，这种金融结构就是最优的。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表现为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差异，这进一步使空间因素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

三、基于金融支持问题展开的各项研究

（一）国外对特定地区金融发展的关注

在国外，对金融支持并没有一个统一、专有的概念，大量文献往往只是研究类似金融支持概念的金融发展问题，例如针对特定地区的金融发展。Gillian Bristow, Peter Gripaios and Max Munday (2005) 通过分析威尔士王国的人口普查数据，认为威尔士的金融、商业结构不合理，各金融和商业服务部门 (FBS, Financial and business services) 呈现出不平衡发展，导致了持续性的经济增速放缓。只有调整服务部门特别是金融服务部门的构成，才能赢得当地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来自较早前的一份 IMF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工作报告，认为金融发展与贫困减缓有一定的直接联系，在进一步分析导致金融不发达原因的基础上，提出了促进金融发展的相应政策，以期用金融支持贫困的缓解，就是针对相对贫困地区的金融发展地区的研究 (Paul Holden and Vassili Prokopenko, 2001)。Galindo and Miller (2001) 运用拉丁美洲各国的数据分析了公共征信系统和金融发展的关系，得出良好的信用征信系统能够显著促进金融发展的结论，进而以支持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企业的发展。一旦拉丁美洲各国具备了美国标准的征信系统，各企业也将显著地在改善信用的过程中得到发展。这实际也是一种有力的金融支持，当然这些也不可避免的成为从宏观层面研究金融与经济关系的文献。

（二）金融支持经济发展的国内研究

在国内，金融支持的概念则被广泛接受，甚至有学者提出应当将其理解为金融支持体系。由于我国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对金融支持问题的研究更多的基于相对落后地区展开，衍生为开发性金融、金融扶贫等问题，以期实现落后地区的跨越式发展。李惠彬、高金龙、曹国华 (2009) 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得出开发性金融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长期均衡关系但不具有显著的因果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开发性金融发展的主导性、超前性。陈元 (2010) 作为国开行行长，回顾我国十多年开发性金融的历程与实践，反思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冲击，肯定了开发性金融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开发性金融一方面加速了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另一方面也将是逆经济周期宏观调控的长期选择。同时，开发性金融也是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有力手段 (陈元, 2010; 何伟民, 2010)。扶贫性金融理论的基础是金融具有分配再分配的功能，必须将闲置的货币收入转化为现实的货币收入，进行风险补偿，求得权利与义务的制衡 (曾康霖, 2007)。据此，杨占法、吴强 (2008) 认为近年来央行出台多项扶弱性信贷政策措施的成效远未达到预期目标，需要吸收美国和泰国的有益经验，结合我国的国情，矫正我国农村金融的短缺事态。来自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的徐荟竹、车士义等 (2012) 则是在调研连片特困区 375 个贫困县后提出了当前发展可持续金融扶贫所存在的问题。

随着经济金融化趋势的日益加强，金融支持经济发展效率关联着经济的平稳与可持续发展。付俊文、范从来 (2007) 认为金融支持能源工业发展必须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把着力点放在促进其可持续发展方面；否则，金融资源配置不合理就有可能引发一定的风险。刘降斌、李艳梅 (2008) 以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东北老工业基地和内陆科技圈四个科技区域为研究范围，通过面板数据分析，认为金融体系均对科技型中小企业自主创新有长期的支持效应，但金融体系的短期支持效应有较大的区域差异。孙爱军、蒋彧和方先明 (2011) 借助 DEA-Malmquist 指数方法，也进一步对金融支持进行量化，并细分到支持的三大产业，结果也表明金融在不同省域发挥的作用和效率存在差异。除开能源产业和企业自主创新问题，也有学者认为节能减排也应当给予金融支持。为循环经济相关的市场主体建立一个良性的、面向市场的投融资环境和绿色金融支持体系，对于加快建立资源节约型社会、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促进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深刻的社会背景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尹钧惠, 2009)。另外，新兴产业发展更需要金融支持，顾海峰 (2011) 构建了“两体两翼”框架下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金融支持体系。该体系主要由以信贷市场为主导的间接金融体系

(子体系)、以资本市场为主导的直接金融体系(子体系)、政策性金融支持机制、市场性金融支持机制等四个部分内容组成。

四、对民族地区经济、金融发展的探索

(一) 国外“民族地区”的相应研究

在对特定地区的金融发展问题进行探讨的过程中,国外文献并没有针对某一民族或者民族地区进行的相关研究,例如在美国,文献中最常见到的相关词汇是少数群体(Minority),其含义是指与普通公民享有不对等权利、甚至是含有歧视性色彩的人群,因此往往指代黑人、妇女、残疾人以及非美国本土的其他裔美籍公民。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已经有大量文献证明,为了促进这些少数群体聚居区的经济发展,市场的作用往往是收效甚微的。Porter(1995)指出,美国城市多数分白人区、黑人区、亚裔区等,多数白人作为富人往往从城市外迁,在市中心,少数群体家庭往往代表的比例更高。因此,需要更多的蓬勃发展的小企业来满足这些族群的需求,为了避免歧视现象的时有发生,这些小企业更多的也是少数群体特征的公司(minority firms),相应的金融服务更多的也来自于少数群体银行¹(minority banks)。基于此,金融支持政策也常常以少数群体计划(minority programs)展开。在Coleman(2008)使用2003年新发布的针对全美中小企业财务状况(2003 Survey of Small Business Finances)的一项调查数据分析得知,黑人拥有的公司(black-owned firms)在经济价值和数量上均处于增长态势,在提供就业以及产品、服务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特别是在城市社区中作用更大。之前的研究表明,黑人拥有的公司比非此类公司有更大的困难获得外部资本(Bates, 1991; Cavalluzzo et al., 2002; Dymski, 1996)。而Susan则证明了这种困难来源于这类公司本身,因为他们更愿意抱有他们会被拒绝给予贷款的想法。

(二) 少数民族的特色金融制度与政策

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建立与之适应的金融支持体系已经是学界的共识,即构建具有民族特色的金融制度与政策安排。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课题组(2006b)对民族地区农村经济与农村金融制度的绩效进行研究,表明了民族地区金融支持的缺乏且绩效不高。郑长德(2007)以5大自治区和青海、云南等多民族省份为研究对象,说明了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金融中介发展落后,表明金融发展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这些都是民族地区的金融浅化的表现,只有在民族地区推行充分体现民族问题特殊性和民族自治地区特点的金融政策,才能应对金融潜在问题(张毅,2010)。

伊斯兰金融的组织形式无疑为民族特色金融制度安排提供了参考,这一概念来源于20世纪的穆斯林复兴运动所产生的当代伊斯兰经济思想,虽与常态的金融体系相异,但至今已运行于世界各大经济体,为伊斯兰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Karen Hunt-Ahmed, 2013)。伊斯兰金融最早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的阿拉伯地区。银行最重要的功能是信用中介,伊斯兰金融机构超越了商业银行的基本职能,发挥了融资租赁、股权投资、信托投资、合资经营等功能。这其中有一个较为重要的支撑就是伊斯兰特殊的宗教法律文化。伊斯兰法将高利贷定为非法的借贷关系,禁止人们参与、经营、运作,否则视为大罪。同时,伊斯兰提倡和鼓励合法的借贷,即“善贷”。它不仅促进了经济的健康发展而且增进了人与人之间的感情(马少彪,2009)。因此,探索伊斯兰金融在我国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当然,我国现阶段在政策环境、公司治理、信息披露等方面都还缺乏引入伊斯兰金融的基础(张睿亮,2012)。另一种研究较多的则是与藏区相关的金融制度安排,通常以畜牧金融、寺庙金融的形式呈现。陈志远(2009)在分析甘南藏区畜牧业发展的基础上,认为发展畜牧金融,及时整合信贷资

¹有关 minority banks 一词,在罗斯(美)第七版的《商业银行管理》一书中被译作少数银行,笔者认为 minority 一词不能与国内少数民族概念混淆,特在此译作少数人群银行。其详细介绍参见 Javed Hussain and Harry Matlay(2007): Financing preferences of ethnic minority owner/managers in the UK. Journal of Small Business and Enterprise Development, Vol. 14 No. 3, pp. 487-500

源，完善惠农金融服务机制，能够有效形成“农牧互补”，实现农牧民增收。但担保机构的建设滞后、金融供给主体单一等因素依然存在，使得贷款难现象并没有根本解决。中国人民银行兰州中心支行课题组（2013）也认为，由于存在政策软约束与可操作性矛盾、贷款规模限制与贷款意愿矛盾、抵押担保不足与贷款保险的需求矛盾，以及贷款期限与生产周期矛盾，导致藏区畜牧金融形式还有很长的发展道路。伍艳、黄煦凯（2006）认为，长期以来，西藏自治区金融抑制现象明显，应当以商业性金融推动寺庙特色经济向外辐射。西藏寺庙经济往往与特色产业结合在一起，如寺庙旅游业、商业、加工业、藏医药、藏香生产等。已在西藏开设分支机构的农、中、建三大国有商业银行可以与寺庙合作。如藏中的寺庙应配合地方政府建立农牧业经济区、藏北建立草原牧业经济区、藏西建立生态农牧业经济区、藏东南建立农林经济区等，突出各区域特色，从而使寺庙成为宗教活动与生产活动相结合的宗教经济主体。

除此，微型金融也应当是支持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金融政策安排。广义来说，微型金融是一种社会运动，它的目标是在全球范围内，为尽可能多的穷人或不富裕者提供金融服务，集储蓄、保险和汇款于一身。在国外，微型金融象征着是对弱势群体的救助，弱势不一定就是贫困、无抵押者，就像在美国微型金融往往和黑人联系在一起一样（Gueyie, 2013）。

（三）国内民族地区的个案研究与对策研究

我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各少数民族呈现出大杂居、小聚居，使得个案研究与对策研究在学术界备受青睐。徐珺（2003）对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实行农户小额信贷进行了个案研究，认为对西部民族地区的金融支持应主要应采取合作金融的形式，即以农村信用社为主体，农户小额信用贷款为手段，拉动这些地区的经济增长。侯晓荟（2005）通过恩施个案的研究，认为当前我国的金融政策体系制约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进程，这是由于统一的金融支持体系无法与民族地区的经济差异相适应。同时，她还认为民族地区的金融组织体系存在严重滞后性，进一步阻碍了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王伟、邓伟平（2011）基于广东清远案例的研究，发现民族地区经济基础相对薄弱，城镇化水平大多处于初期和中期，金融作为一种要素集聚，可以有效支持其城镇化建设。在现代经济框架下，集内在市场推动和外由政府引导为一体的“政府诱导型”金融，将加速民族地区城镇化进程，形成后发优势。闫丽娟、王玉君（2011）以民族学田野调查的方法，对村庄扶贫互助合作社在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县的试点工作的进行了调查与分析，说明了民间金融对于金融支持体系的重要意义。

由于自然、历史、文化及经济政策等因素的制约，加之金融运行环境不够理想，在一定程度上也制约了该地区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梁平、郭曦、马智利（2005）认为应通过完善农业投融资机制、发展农业保险、谨慎开展金融创新等措施以推动该地区农村经济发展的步伐。廖群云（2005）认为金融支持弱化是当前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中面临的重要问题。经济质量不高、信用环境不良、法制建设滞后、政策引导不力是民族地区金融支持弱化问题产生的根源，并据此提出一系列政策建议。同时，民族地区企业发展不强，金融支持不足，是制约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要解决民族地区企业的发展问题，郑军，周运兰（2012）认为要从企业自身、金融支持、政府扶持等层面着手：一是企业要转变观念、规范治理、提高自身实力与信用度；二是要从金融发展出发，健全金融机构设置、规范内部管理；三是加大财政支持、强化财税支持政策。

五、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的简要评价

综上所述，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这一问题的研究上，国外文献众多，不仅形成了金融发展理论，而且通过大量实证研究基本形成了一定研究体系。这为国内学者的后继研究提供了可靠的理论基础，使得国内的大量研究在结合我国国情的基础上取得了一定成就，但综合来看，相关研究仍存在以下不足：

（一）对民族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不足

从国内外相关文献可以看出，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探讨已经形成了众多理论，但针对民族地区的相关研究还存在空白。且国内相关文献多以三大地带、省域而展开研究，并没有以民族地区为整体研究的文献。在二者关系上，由于大量文献的研究结果都表明在西部地区这种关系不显著，而少量文献则以简单的民族地区界定——五大自治区数据同样获得不显著的特征，学界也多在这些基础上展开定性研究，默认民族地区二者关系不显著。但在实际中，要解决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特别是金融制度安排与政策制定等，需要充分研究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值得欣慰的是，大量的国内外文献在理论和实证方法上为民族地区的研究提供了夯实的基础。

（二）民族地区范围界定不一，缺乏可靠的定量研究

鉴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问题应当受到学界的关注和重视。而现有研究多以东、中、西部地区为板块而开展，甚少涉及到单从民族地区展开的相关研究，一是由于少数民族地区数据获取难度较大，二是由于西部地区数据在多项研究中不显著。这些因素都部分造成了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研究多为定性研究，其中尤以个案研究和对策研究居多。因此，学界顺理成章的将西部地区的研究结果套用在民族地区之上，忽视了对民族地区的定量研究及结果解释。此外，学界对民族地区的研究范围界定也多不一致，大量文献均以 5 大自治区，或者加上几个多民族省份的数据，从而简单代表民族地区，这种定量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并不能真实反映民族地区的面貌。

（三）民族地区的特殊性需要纳入经济发展的研究之中

基于国外的多种金融发展理论，大多数文献没有考虑到真正的中国国情，以金融抑制、金融深化或者金融约束理论为金融扶贫政策提供理论支撑，将贫困、落后的原因简单归结为金融的不发达，这是将经济发展问题单纯归结为经济增长的后果。经济发展不仅意味着国民经济规模的扩大，更意味着经济和社会生活素质的提高，而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更应考虑民族差异、宗教差异等特殊因素，仅以经济增长作为研究对象，体现不了少数民族地区的特殊性。现有文献大多都认可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其特殊性，但是究竟特殊在何方面，与非民族地区有何差别、地区内部有何差别则很少探讨，特别缺乏对这种特殊性的量化表达。

（四）多为个案或特定地域的研究，缺乏整体性的分析

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的研究多见于针对特定民族的案例研究，没有将少数民族地区作为一个区域整体进行研究，因此常常使大量文献更加关注特定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脱贫等问题，忽视了少数民族地区金融发展问题。近年来，随着各地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各地政府也相应出台多种金融政策支持经济发展，使得关注诸如伊斯兰金融、藏区金融、牧区金融等问题的文献大量涌现，但大多停留于对策建议研究，缺乏对民族地区金融发展问题的整体性探讨。这也是对民族地区金融与经济关系定量研究不足的表现，因为无法确定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就无从得知影响金融发展的各种因素，而至少经济发展是这些因素中较为重要的一个方面。要实现整体性的把握民族地区经济、金融发展问题，就需要对民族地区实现一种可能的分类。

（五）空间因素分析不够，民族地区内部差异较少分析

在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关系问题的研究中，国内学者常将研究范围划分为东、中、西三个区域，忽视了各区域内差异的存在，特别是对民族地区区域内经济差异重视不够。耶鲁大学的经济学家休·帕特里克（Patrick, 1966）在研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过程中，认为其关系程度取决于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并提出了一种可能的解释，即存在经济发展的“门槛效应”，随后为众多学者所认可。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幅员辽阔、民族差异明显，其区域内部经济发展也存在较大差异，实际上也存在着“门槛效应”，因此金融支持政策也需要体现这种“门槛”的里外差异。而一种可行度量手段则是地理要素的空间相互作用分析。

参考文献:

- [1] Arellano, M. and Bond, S. (1991), Some tests of specification for panel data: Monte Carlo evidence and an application to employment equations[J].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pp. 277-297.
- [2] Arena, Marco (2008), Does Insurance Market Activity Promote Economic Growth? A Cross-Country Study for Industrialized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J]. *Journal of Risk and Insurance*, Vol. 75, No. 4, pp.921–946.
- [3] Bates, T (1991), Commercial bank financing of white- and black-owned small business start-ups[J]. *Quarterly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Vol. 31(1), pp. 64–80.
- [4] Bencivenga, Valerie R.; Smith, Bruce D. and Starr, Ross M (1995), Transaction Costs, Technological Choice, and Endogenous Growth[J].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Vol. 67(1), pp. 53-117.
- [5] Cavalluzzo, K., Cavalluzzo, L and Wolken, J (2002), Competition, small business financing, and dis-crimination: Evidence from a new survey[J]. *The Journal of Business*, Vol, 75(4), pp. 641–679.
- [6] Coleman, Susan (2008), The Use of Debt by Black-owned Firms: Recent Evidence from the 2003 Survey of Small Business Finances[J]. *Journal of Developmental Entrepreneurship* Vol. 13, No. 1, pp. 39–57.
- [7] Driscoll, J., and Kraay, A. C. (1998), Consistent covariance matrix estimation with spatially dependent data [J].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Vol. 80, pp. 549–560.
- [8] Dormann, Carsten F.; McPherson, Jana M.; et al. (2007), Methods to account for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in the analysis of species distributional data: a review[J]. *Ecography*, Vol. 30, pp. 609-628.
- [9] Fukui, Ryu and Llanto, Gilberto M. (2003), Rural Finance and Microfinance Development in Transition Countries in Southeast and East Asia [R]. PIDS (Philippine Institute for Development Studies), Research Paper Series, No. 2003-12, pp. 1-15.
- [10] Farah Aida Ahmad Nadzri, Rashidah AbdRahman and Normah Omar (2012), Zakat and Poverty Alleviation: Roles of Zakat Institutions in Malaysia[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rts and Commerce*, Vol. 1 No. 7, pp. 61-72.
- [11] Gallup, J L.; Sachs, J D., and Mellinger, A D. (1999), Geograph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R]. CID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t Harvard University) Working Paper No. 1.
- [12] Galindo, Arturo and Miller, Margaret (2001), Can Credit Registries Reduce Credit Constraints? Empirical Evidence on the Role of Credit Registries in Firm Investment Decisions[R]. Washington, DC: The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 [13] Hellmann, Thomas F.; Murdock, Kevin and Stiglitz, Joseph (1995), Financial Restraint: Towards a New Paradigm[R]. Working Papers (Faculty), Stanford 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
- [14] Hansen, Bruce E. (1996), Inference When a Nuisance Parameter is not Identified Under the Null Hypothesis[J]. *Econometrica*, Vol. 64, No. 2, pp. 413-430.
- [15] ILO (2005), India: An Inventory of Micro insurance Schemes[R]. Geneva: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Strategies and Tools against social Exclusion and Poverty (STEP) Programme, Working Paper no. 2 pp. 1-210
- [16] Jayaratne, Jith and Strahan, Philip E. (1996), The Finance-Growth Nexus: Evidence from Bank Branch Deregulation[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11, No. 3, pp. 639-670.
- [17] Love, Inessa and Zicchino, Lea (2002),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dynamic investment behavior : evidence from panel vector autoregression[R]. The World Bank WPS. 2913.
- [18] Mathieson, Donald J. (1980), Financial Reform and Stabilization Policy in a Developing Economy[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 7, No.3, pp. 359-395.
- [19] Outreville, J. François (201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surance Growth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80 Empirical Papers for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R]. ICER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12/2011
- [20] Patrick, Hugh T. (1966),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in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J].

-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e Change, Vol. 14, No. 2, pp. 174-189.
- [21]Ram, Monder and Smallbone, David (2001), Ethnic minority enterprise policy in practice[R]. Final report prepared for the Small Business Service, pp. 1-54.
- [22]Santiago CarbóValverde and Francisco Rodríguez Fernández (2004), The Finance-Growth Nexus: A Regional Perspective[J]. European Urban and Regional Studies, vol. 11, No. 4, pp. 339-354.
- [23]Stock, James H. and Watson, Mark W. (2004), An Empirical Comparison of Methods for Forecasting Using Many Predictors[R]. The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 [24]Tobin, J. (1965), Money and Economic Growth[J]. Econometrica, Vol. 133, No. 14, pp. 671-684.
- [25]Vessey, Iris and Galletta, Dennis (1991), Cognitive Fit: An Empirical Study of Information Acquisition[J]. Information Systems Research, Vol. 2 No. 1, pp. 63-84
- [26]Weil, David N (2009), Economic Growth, 2nd Edition[M]. Pearson Education, Inc.
- [27]白钦先 (2000):《再论以金融资源论为基础的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范式转换、理论创新和方法变革》,《国际金融研究》第2期,第7-14页
- [28](美)巴尔塔基(Baltagi, B.)著,白仲林等译(2010):《面板数据计量经济分析(原书第4版)》,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 [29]陈志远(2009):《甘南藏区畜牧金融发展趋势及存在的问题》,《中国金融》第16期,第84页
- [30]陈元(2010):《开发性金融与中国城市化发展》,《经济研究》第7期,第4-14页
- [31]曹刚(2003):《金融支持少数民族区域经济发展的建议》,《中国金融》第19期,第16-17页
- [32]曹廷贵(2005):《我国金融改革理念与方式的误区》,《财经科学》第3期,第20-25页
- [33]丁志勇,任佳宝(2010a):《少数民族地区金融支持经济发展的实证研究》,《统计与决策》第16期,第119-121页
- [34]复旦大学拉丁美洲研究室(1986):《拉丁美洲经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 [35]方先明,孙爱军,曹源芳(2010):《基于空间模型的金融支持与经济增长研究——来自中国省域1998~2008年的证据》,《金融研究》第10期,第68-82页
- [36]李敬,冉光和,万广华(2007):《中国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的解释——基于劳动分工理论与Shapley值分解方法》,《经济研究》第5期,第42-54页
- [37]林毅夫,姜烨(2006):《经济结构、银行业结构与经济发展——基于分省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金融研究》第1期,第7-22页
- [38]刘锡良(2004):《论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金融与经济关系的总体考察》,《“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与中国金融的发展和创新的”研讨会暨第二届中国金融论坛论文集》,第41-50页
- [39]曾康霖(2008):《二元金融与区域金融》,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第269-290页
- [40]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09):《中国的民族政策与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白皮书》,北京:人民出版社

The Research of the Financial Support Policies on Minority Nationalities Regions in China

Liu Bo

(Chinese Financial Research Centre of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Chengdu, 610074)

Abstract: Finance is the core of modern economics. The financial developments have huge impacts on 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 developments. As a result, the financial support policies are very important to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minority nationality regions. On one han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s in minority nationality regions are the premises of the financial developments in these areas. Secondly, On the other hand, the financial developments reversely

have good impact o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s in these areas.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finance and economics are complex, often shown as relevant, restricting each other, pushing forward each other. This requires explore the issue of the adaptation of national regional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namely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minority areas specific state, targeted selection with financial support adaptation policies that financial development without departing from the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ultimately promote economic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regions.

Key words:Minority nationality regions, Financial support policies, Threshold effect, Spatial disparities

收稿日期: 2014-4-19

作者简介: 刘博, 西南财经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金融学博士生, 研究方向: 金融理论与实践